

大家

小书

大家

小书

史籍举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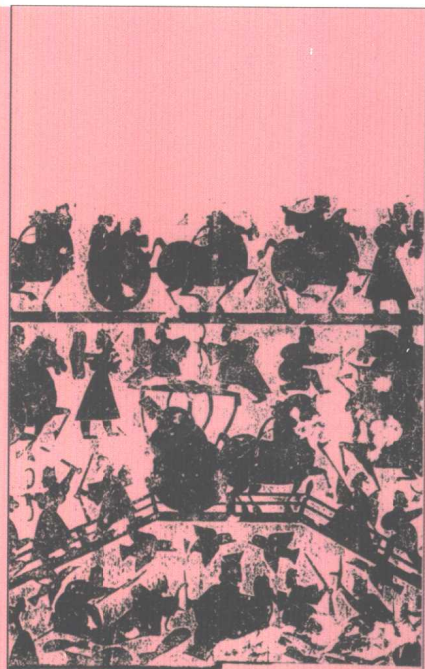
柴德赓 著

北京出版社

史籍举要

柴德赓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小书

史籍举要

柴德赓 著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籍举要/柴德赓著. -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1
(大家小书)

ISBN 7-200-00380-8

I. 史… II. 柴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史籍-简介 IV. K2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7258 号

· 大家小书 ·

史籍举要

SHIJI JUYAO

柴德赓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2.625 印张 223 000 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 000

ISBN 7-200-00380-8

K·37 定价: 19.00 元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



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、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2015/02

登堂入室的门径

——《史籍举要》重版前记

瞿林东

柴德赓先生（1908—1970）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，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。他的《史籍举要》一书，原是一部遗稿，由作者的几位学生邱敏、胡天法、许春在等同志整理，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教授审订和修补，于1982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，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评。近20年来，人们时时还在谈到它。北京出版社最近编辑、出版名为“大家小书”的系列著作，收入《史籍举要》一书，正是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关心史学、阅读史书的需要。这说明，《史籍举要》一书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。

《史籍举要》问世后，学人多有专文评价。吕叔湘先生指出：《史籍举要》全书“脉络贯通”，评论“恰中肯綮”，“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”。“有志于史学的人，手此一编，费力省而得益多，登堂入室，左右逢源，对于著者一定是感激不尽的。”（1990年5月2日《光明日报》史学专刊）从我对本书的阅读和理解来看，我认为，这些话最能反映本书的精髓，也最能反映读者的感受。



在《史籍举要》收入“大家小书”再度面世之际，北京出版社和柴先生亲属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导读性质的文字。我深感自己学力不够，难以胜任，但于情于理，却又不好推辞，乃仅就我对本书的一些认识，撰成此文，供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参考。

一、胸中自有史书全局

《史籍举要》是柴先生的讲义手稿，是他多年治史心得的荟萃，实非一般著述可以与之同日而语。本书从讲授史籍入手，而涉及到史学的许多方面，进而又涉及到历史评价的诸多问题。在作者这里，研究历史同研究史学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。史籍、史学、历史的融会贯通，使作者所论，可以古今联系，纵横驰骋，读来视野开阔，获益良多。

这里，仅就作者对中国古代史籍的“举要”来说，可谓如数家珍，举重若轻，侃侃而谈，使听之者不知其倦。这是因为作者胸中自有史书全局，才能达到如此境界、如此效果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
首先是选书。会通方能“举要”，博览才可善择。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如何“举要”？即选择哪些书予以评介？这不是一个简单数量多寡的问题，实是作者治史功力的显露。中国古代史籍，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

史部分史书为 13 类起，历代相沿，稍有损益，至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分史书为 15 类，即正史、编年、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诏令奏议、传记、史钞、载记、时令、地理、职官、政书、目录、史评。若以《史籍举要》所选之书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分类相对照，作者只选了纪传体类（即正史）、编年体类、纪事本末类、政书类、传记类、地理类等 6 类史书。作者略去的是有关言论、官制、目录、评论，而突出了人物、事件、政治和地理，从这个比较中，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卓识：纪传体类、编年体类、纪事本末类、政书类史书，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，它们分别是于综合叙事中以人物为中心、以年代为中心、以事件为中心、以制度为中心，这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文献；传记则是对纪传体类史书的补充，地理类史书向人们提供历史演进之地理环境和建置沿革的基本知识。这几类史书相对于其余一些类别的史书，是基础性的，是重要的。而面面俱到，突出不了重点，甚至掩盖了重点。这个道理，是不难理解的。

当然，选书，不只是在对待史书的类别上，还进而反映在同类书中书目的选择上。作者于纪传体类史书，重点讲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等，或因其地位的特殊，或因其流传中存在着认识



上的歧异，作者格外多着笔墨。作者于编年体类史书着重论述《资治通鉴》，于政书类史书着重论述《通典》等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就全书来说，作者是把重点放在纪传类史书之上，同样反映了作者的“举要”确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来的。这是因为：其一，纪传体类史书，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主体，具有突出的重要性；其二，纪传体类史书综合地反映历史，是每一个初学者应当首先学习和了解的；其三，纪传体类史书便于人们阅读，如朱熹回答学生所问读史之法时说：“《通鉴》难看，不如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事多贯穿，纪里也有，传里也有，表里也有，志里也有。《通鉴》是逐年事，逐年过了，更无讨头处。”有学生问：“读《通鉴》与正史如何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好且看正史，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。只如高祖鸿门一事，《本纪》与张良、灌婴诸传互载，又却意思详尽，读之使人心地欢恰，便记得起。《通鉴》则一处说便休，直是无法，有记性人方看得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）朱熹的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。读史，先读正史，收获会更显著一些，这是正史的特点所决定的。当然，朱熹的这些话，也是从比较的意义上说的，关于读史，他有一个总的看法，这就是：“先读《史记》，《史记》与《左传》相包。次看《左传》，次看《通鉴》，有余力则看全史。”（同上）这也是先有重点而后及于一般。柴先生的选书，有不少地

方同朱熹论读史相合，可见古今之通达学人，见识上多有相通之处，其间贯穿着全局和“举要”的辩证法。

其次是阐说。柴先生在阐说一些史书时，都能上下贯通，左右联系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出作者胸中自有史书全局的器识。如论《史记》的价值时，作者指出：“金代王若虚《溇南遗老集》中有《史记辨惑》十一卷，批评《史记》有十失，皆文章之事，大多不中要害。宋代仇思也做过一部《迁书删改古书异同》。《史记》改古书，特别是改《尚书》的语句，这没有什么不可以，但有人误会了，以为《史记》所载的就是古书原文，反以别的书中所引原是不误的为误，这是不了解司马迁著作大意的缘故。”作者对《史记》评论的研究，达到如此细致的地步，可见作者视野之恢宏。又如阐说《汉书》的优缺点时，对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提出这样的见解：“一般评论《汉书》，常以限断不明为班固缺点，如《古今人表》，但有古人，无今人，从刘知几以来都有讥弹。顾名思义，班固应有今人表，不过论古人分为三品九等，没有问题，论汉代人 also 分九等，形势有所不可。如古代帝王多列八九等，那么汉代十二帝应如何安排呢？不用说班固，就是司马迁要这样做，也只好‘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’了。章学诚以为此表非出班固之手，疑为西汉学者所为，班固收入《汉书》，这出于臆想，也不是紧要问题。我们认为《古今人表》和《汉书》



其他篇目一样，有些是补《史记》所不足的，流传于今天。我们从《古今人表》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已把人分成九等，为后来九品中正制度先作注脚，说明源流已久。其次，这个表中不以地位定等第，而以人品分高下，反映儒家思想在封建统治时代的势力，不是没有用处的。”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，作者对史书的阐说是怎样同对历史的理解相联系的：从《汉书》联系到《史记》，联系到章学诚，联系到九品中正制度，联系到以人品分高下的儒家思想原则等等。又如作者讨论《资治通鉴》，不仅对它的编纂方法有翔实的论述，而且对南宋朱熹及其门人的《通鉴纲目》、元初胡三省의《资治通鉴注》、明代严衍等人的《资治通鉴补》等都有简明扼要的评介。像这样的一些阐说，把史书与史书、史书与历史都联系起来，作融会贯通的理解，给读者的启迪、教益尤为突出。

二、整齐体例以示读史门径

《史籍举要》全书有严格的体例，这是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受到许多读者和专业工作者的称道。作者在本书《前言》中明确地规定了撰述的体例，即：“以史籍性质分类择要来讲，可分下列四个重点：（一）作者及著作时代；（二）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；（三）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；（四）注解及版本。

这只是大概，具体史书，讲法可以变动，不完全以此四点为限。”这样的体例，贯穿于全书之中，而对纪传类史书、《资治通鉴》的评介最为详备，即有明显的标目；对其他史书，虽无明显标目，但阐说之中亦遵循此例。当然，如作者所说，“具体史书，讲法可以变动”，这是既有体例，而又不为体例所拘，是对体例的灵活运用。

我要强调的是，作者为本书所制定的体例，固然也是为了撰述和讲解上的方便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体例向读者指出了读史的门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要读一部史书，进而要认识、研究这部史书，应从哪里入手？作者所说的上述四个方面，应视为向导和指南。举例来说，阅读《史记》，如作者所示，应注意弄清楚下列问题：（一）《史记》的作者；（二）《史记》的史料来源；（三）《史记》的编纂方法；（四）《史记》的价值；（五）《史记》的补缺问题。关于阅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作者指出弄清以下几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，这就是：（一）《通鉴》的作者；（二）《通鉴》的史料来源；（三）《通鉴》的编纂方法；（四）对《通鉴》的评论；（五）《通鉴》胡注；（六）与《通鉴》有关的几部书；（七）《通鉴》的版本。对不同史书的评介，标目多寡并不完全相同，但体例上的要求，大致是相同的。

唐人刘知几说过：“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



无法，则上下靡定；史无例，则是非莫准。”（《史通·序例》）这是强调体例对于史书的重要性。就《史籍举要》来说，其“是非”所在，一是关乎撰述内容，二是关乎读史门径。从作者来看，是用这个体例来组织、叙述那些最必要的内容，向读者展示各种史书的风采。从读者来看，是根据这个体例规范的框架及其所展开的解说，依次走进那一部部名著。

按照我的理解和肤浅认识，这些体例的意义在于：

——关于作者。了解作者，是了解有关史书的基本要求。清人章学诚说：“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；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处，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。身之所处，固有荣辱、显隐、屈伸、忧乐之不齐，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，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，况生千古以后乎！”（《文史通义·文德》）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作者本人的际遇，对于了解作者的撰述旨趣和撰述中的得失、特点，有直接的意义。

——关于史料来源。了解一部史书的史料来源，不仅可以加深对于本书的认识，而且对于考镜源流有极大的帮助，建立起有关史料与所读史书之间的历史联系，并且可以据以判断作者对于这些史料运用的情况，以便于作出恰当的评价。

——关于编纂方法。这是了解史书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的必要环节，并由此探索史书在思想和内容上

的特点与成就。如作者论《史记》的编纂方法时写道：“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和列传等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。这种方法，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，开创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类史书的编纂方法，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‘正史’的典范。”这种编纂方法所形成的史书，是对历史面貌的全面反映，是人们认识历史的最重要的途径。本书作者以大部分篇幅来介绍纪传类史书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又如作者讨论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方法，首先讲到它的体例，如限断问题，长编问题，纪年问题；其次讲到它的史料，如取舍问题，异同问题，因事立论问题，全书目录问题等。作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，充分揭示了《资治通鉴》全书的结构及其编纂过程，大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。凡此，都是这个道理。

——关于评价。此即作者说的“优缺点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”。这是读史的关键之处了，不论是认识史书、研究史书，还是使用史书，都不可不明了它的长短得失，它在史学发展长河中起过什么作用，处于什么位置，今天有何价值等等。《史籍举要》一书，自始至终贯穿这一思想旨趣，不限于“优缺点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”这一题目之下才讲到这些内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在论到前人评价的同时，往往也发表自己的评价；而作者自己的评价，正反映了作者在史



学方面的卓识，对此下文要作专门论述。

——关于注解及版本。注解，是解读原书的工具之一，也是研究原著的重要资料；有的名注，本身就有很高价值，自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。版本，其流传情况是了解史书的历史价值的依据之一，不同的版本还提供了研究相关史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种种问题，而好的版本则为读史者提供了方便。因此，版本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。

总之，《史籍举要》之所以有一个整齐的、大致贯彻始终的体例，正是表明了作者力图向读者指出如何通向读史的门径。从专业的眼光来看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。有了这样的基本功，才有可能登堂入室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史学工作者。

三、于评论中见卓识

柴先生在《史籍举要》中，就一些史书发表了评论。这些评论，是柴先生多年研究所得，显示出他在史学上的卓识。按照一般情况来说，他的这些见解和卓识，是可以写成专论或专书的，而作者却把它们寓于这本“举要”之中奉献给广大读者，使读过本书的人大受教益。

柴先生对史书的评论，常在历史上有争议处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如关于范晔《后汉书》的史论，范

晔自视甚高，后人有提出讥刺的，也有表示称赞的。柴先生指出：“范晔于《后汉书》各卷多数有论或序，议论有独创之见。”他举出卷十五中范晔之论不信讖文、卷十三中范晔之论批评“好巫”、卷七十一范晔之论认为曹操有“功高势强”的局面而终能代汉、卷七十九范晔之论称“群英乘其运”以表明刘汉皇朝并非不可动摇的观念等等，认为范晔在历史观点上确有很高的见解。又如李延寿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在历史上也是褒贬各异，清人王鸣盛对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更是完全否定。柴先生指出：“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最不赞成李延寿，几乎开口便骂。”“王氏意在使人重视八代史（即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等八书——引者），不可偏信延寿之书，而结果又将八代史所以残缺，归罪于李延寿作南北史。如此论证，适足以证明延寿书必有过于八代史之处。总之，南北史与八代史相辅两行，可以相互参证。八代史不能亡，南北史亦不可废，具体得失，在研究南、北史事者细心分析而已。”显然，这是合乎实际的公正的评价。类似的评论，见于书中许多地方，读来都有发人深省之效。

柴先生对史书的评论，还十分注重于用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是非得失，不完全是局限于文字上的论争。他评论范晔《后汉书》说：“范晔作《后汉书》，从材料方面讲，有诸家《后汉书》可以参考，此外，传世



史料尚多，不忧材料缺乏，这是有利条件。但诸家《后汉书》各有所长，行世已久，新编一书，欲求超过前人，也不很容易。可是，范氏书一经流行，诸家《后汉书》逐渐销沉，至于散失，可见范书必有过人之处，因而成书晚却又能后来居上。”这段话，把范曄作《后汉书》的有利条件、艰难之处及其终于为后世所承认的原因都讲到了，其评论的基点则是从历史事实出发。又如魏收《魏书》，自北齐以下至今，人们在认识上多有歧异。柴先生客观地写道：“如果不是高氏父子支持魏收，《魏书》一定要被毁灭。虽然如此，魏收到后来也受到挫折，甚至北齐亡国之时，冢墓被发，弃其尸骨于外。可见当时人士怀恨魏收，欲推翻《魏书》，决不以修改本为满足，其事至明。至隋代遂有命魏澹重撰《魏书》之事。”“总之，魏收书虽自北齐至唐为人所不满，但改撰之本，毕竟不能胜魏收原本。至今《魏书》长存，改撰之本仅留残简于魏收书中，也可以看出魏收书自有它站得住脚的地方。”在《二十四史》中，《魏书》是最有争议的一部书，至今仍有人以其为“秽史”的代表，究其原因，一是没有深入考察魏收作史时的社会环境，二是没有细致探究“秽史”说的由来，以至于难免人云亦云之嫌。柴先生着重从历史事实来评价《魏书》，是值得人们重视和效法的。同样，他对杜佑《通典》的评论，也能给人以这样的启迪。